



廖沫沙全集

三家村文库

第一卷

本书是作者生前未及出版之遗著。一俟作者百年忌
日，即为拙作题签。一俟作者百年忌
字，自便当不少于增加十倍也。

我曾给想过，这些稿本，既不是

军事理论著作，又不是新闻报导，

或如某些信函一些军事史料，

价值。因此我本信

将之送给军事研究机构，

作为参考资料，而不予出版。后来

为你们索取而去，实出意外，现在又

得到廖爱厚同志题签，为以青徐

色，则更出意外。这原原始，这都不

能不你们。我和我的书稿就不算自

己，但你们却是实实在在的伯乐了。

喜幸降临，祝你们

工作顺利！

廖沫沙

I217.2/78

非常感谢你，祝我无限爱共

三家村文庫

题签：一往休看第

廖沫沙全集

字，身价当不少于增加十倍。

稿存，既

第一卷

花城出版社

或报文学，仅保留一些战前——

没有出版成书的價值。因此我

将这些稿本捐献军子，此机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廖沫沙全集 (第一卷) / 花城出版社编 · —
广州: 花城出版社, 1997. 11

(三家村文库)

ISBN 7-5360-2472-X

I. 廖…

II. 花…

III. 现代文学—中国—全集

IV. I 21

廖沫沙全集

第一卷

*

花城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 11 号)

广东省新华书店经销

广东惠阳印刷厂印刷

(广东惠州市南坛西路 17 号)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17 印张 8 插页 400,000 字

1997 年 11 月第 1 版 1997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6,000 册

ISBN 7-5360-2472-X

I · 2130 定价: 32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廖沫沙全集》序

郑天翔

廖沫沙同志是一位真正的共产党员。他为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解放，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了一生。他给我们留下了大量的著作。《廖沫沙全集》把现在能够收集到的沫沙同志的著作大都集中起来了。通过这个文集，人们可以看到廖沫沙同志是怎样经过曲折崎岖的道路，顶着急风暴雨，始终如一地为革命事业奋斗，对中国人民始终如一的忠诚。

廖沫沙同志是一九三〇年入党的老党员，是一位杰出的革命文化战士，是一位著名的杂文作家和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卫士。从一九三〇年到一九三六年间，在国民党反动统治的上海，他三次被捕。面对白色恐怖，他坚贞不屈，出狱后马上找党组织，继续战斗。一九三七年抗日战争爆发后，他偕同战友，奔赴武汉，立即投入抗日斗争。他的武器是笔，他主要是用笔进行战斗。日本帝国主义是中华民族的死敌。沫沙同志入党的次年就是“九·一八”事变，国民党反动政府不抵抗，东北三省迅速沦亡。翌年，淞沪抗战，日本帝国主义疯狂地进逼，蒋介石不仅不抵抗，还破坏爱国部队的英勇抗战。这使廖沫沙和他的同志们和广大人民无比愤慨。他们看到：不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中国革命，中国人民的

解放，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都无从谈起。抗日战争是中华民族独立，中国人民解放的最宏伟、最具有决定意义的斗争。廖沫沙立即用他犀利的笔投入这场斗争。他到湖南办报、到桂林办报、到重庆办报、又到香港办报，他又当编辑，又要写稿，写社论，写时评，短评，写政治评论，写军事评论，还要写文艺评论，以及副刊所需要的各类文章，如他自己所说“是无所不谈，无所不论”。所有办报都是根据党的指示，党需要他到哪里办报，他就到那里办报；所有的谈论都是为了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他热情讴歌抗日战场上英勇顽强、杀敌立功的英雄，批判和揭露躲在后头，积极反共，消极抗日的国民党顽固派，宣传群众，教育群众，组织群众。怎样对抗日、对党、对人民有利，他就怎样谈论。为了坚守战斗岗位，沫沙同志遭受了人世间最为惨痛的痛苦。然而，他挺过来了，岿然屹立于他的战斗岗位。他对民族解放和革命事业的忠诚使他达到一个忘我的境界。面对着白色恐怖，面对着飘忽不定、物质贫乏的生活，面对着日寇的狂轰滥炸，沫沙同志置个人安危和生死于度外，始终如一。在他身上体现着一个真正的共产党人的崇高的品格和道德情操。

沫沙同志温文尔雅，但是，真如人们所说，柔中有刚。在“文化大革命”中，他同“三家村”的两位“村友”邓拓、吴晗首遭劫难。邓拓含冤玉碎，吴晗被批得体无完肤，死去活来，后来被折磨身亡。沫沙同志本人则是头破血流。在一次批斗会上，他看见吴晗，还互相取乐，并以诗相嘲。他《嘲吴晗并自嘲》诗曰：“书生自喜投文网，高士如今爱折腰。扭臂裁头喷气舞，满场争看斗风骚。”自居高士，自唱“不畏严寒与酷暑”。他在囚禁之中，还有那么一种闲情，把桔子皮捏成花朵以自娱。而对于气势汹汹的审讯人员，则娓娓而谈，语带幽默，表达了对那种“胡来”的蔑视。他毫不在乎地对那些动辄以死吓人的说，“我已经罪恶滔天，再多添一些，也滔不到天外去”。“死，吓不倒我”。斗罢归来，他

又作起诗来，说“时人不识余心乐，将谓偷闲学拜年”。看一看这样的诗，看一看他在“瓮”中的创作，人们可以感觉到这位忠诚于自己理想的革命战士的骨头是多么硬！

沫沙同志的骨头这么硬，那是因为他通过刻苦学习马克思主义，学习中国优秀文化遗产，通过革命的艰苦斗争和磨难，掌握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懂得了人类社会进步发展的客观规律，他的世界观得到根本改造，他的人格就会发生飞跃，他的言论，行动，做人处世，就会达到一个新的境界，达到以党和人民的利益为最高利益，个人利益服从于党和人民的利益的境界，为了党和人民的利益可以牺牲自己的利益以至生命的境界，体现了人类历史上最高尚的道德，最纯洁的情操，最灿烂的精神文明。

《廖沫沙全集》像所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老革命家的著作那样，留给下个世纪，供后人学习和研究。

二十世纪是中国从黑暗走向光明的世纪。出现了前仆后继的伟大的民族解放运动，伟大的人民革命战争；出现了伟大的革命家、战略家、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在长期的革命斗争和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中国人民创造了以往任何历史时期都望尘莫及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二十一世纪要向二十世纪学习。中华民族的解放，中国人民的翻身，就是从学习前人中得来的。前人的理论和实践、失败和成功，是最伟大、最具有创造力的大学校。后代人一定要超过前人，这是毫无疑义的。但是，必定要在学习前人中超越前人。我们的后代承担着把共产主义理想坚持下去，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坚持下去的责任。他们会取得成功，同时，会遇到困难和曲折。他们前进的方向是明确的，但也可能出现某些阴影，某些迷惘，某些彷徨和某些失误。他们的前人是怎样在黑暗中摸索到光明，怎样在曲折的道路中找到坦途，怎样在汹涌的波涛中把握正确航

向，一句话，怎样从失败走向胜利的？研究前人走过的路，是取得成功的最重要的途径。自上世纪中叶以来，中国人民走过的路是非常曲折的。但经过无数牺牲和千难万苦，终于找到了正确的道路。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它反反复复教给中国人民：只有马克思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的实际相结合才能救中国，才能发展中国。这是一个重复了多少次的论断。越往后，越来越多的人会越来越深切地认识到这个论断的正确性和迫切性。

我们就要进入二十一世纪了。现在的青年人在下个世纪要担当起前人交给他们的历史重任。他们首先要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武装起来，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必须与中国的实际相结合，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老一代革命家给我们留下来的丰富的精神遗产是中华民族优良传统最好的继承者和发扬光大者。现在，老一代革命家的文集、选集、传记、回忆录已经出版了一大批。还要继续出版。它们不仅生动地叙述了我国革命的历史，中华民族由衰败走向振兴的历史，我国人民翻身得解放的历史，还形象地描述了老革命家的风采。这些，是二十世纪留给二十一世纪的最为宝贵的精神财富，人们可以从这里学习怎样革命和怎样做人，可以从这里得到战胜困难的智慧和力量。

《廖沫沙全集》展示了一个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国青年怎样刻苦地学习马克思主义和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怎样做人处事的历程。谨此为序。

一九九六年九月三十日

执著的追求 坦荡的胸怀

——忆廖沫沙同志

张友渔

“三家村”是“文化大革命”中的一大历史冤案，曾经轰动海内外。经过“十年浩劫”，廖沫沙同志是“三家村”唯一的幸存者。

沫沙同志一九三〇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半个多世纪，在党的新闻、思想、文化战线上，风风雨雨，奋斗了一生，是一位敢于为真理而献身的优秀的共产主义文化战士。去年十二月二十七日来他溘逝的消息，我很吃惊。当年的十月八日和十二月十一日，原《华商报》和《新华日报》在京的同志，先后两次聚会，为我们八十岁以上的老人祝寿。他是老人之一，曾兴致勃勃地讲了话。据他的亲属讲，他去世的当天中午，还与友人小酌，谈笑风生。下午，他觉得身体不适，当医生前来抢救时，他已坐在沙发上，坦然而无遗憾地长眠了。他去得匆忙，走得安详，以至于我们这些与他共事多年的老同志、老朋友未能在他临终前见上一面！每一念及于此，沫沙同志的音容笑貌犹在眼前。缅怀他八十四年走过的道路，许多往事涌上心头。

沫沙同志一九〇七年一月，出生于湖南长沙县东乡的一个农民家庭。他的父亲曾当过兵，参加了甲午战争和抗击八国联军占

领北京的战斗。沫沙同志五岁进乡里的私塾读书，高小毕业后，考入长沙师范学校。当时正是“五·四”运动之后，革命热潮风起云涌。他受进步教师和学生的影响，开始阅读《向导》、《新青年》等书刊，并参加了学生运动。一九二七年，长沙发生了“马日事变”，大批革命者遭到屠杀。面对国民党的叛变和凶残，血气方刚的沫沙同志毅然加入到革命行列。在残酷的斗争中，他的革命意识开始觉醒，认识到要推翻黑暗的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必须寻求真理，进行革命。他积极参加了进步学生举行的罢课和集会，名字被列入了国民党要捕杀的黑名单。为了寻求革命道路，他只身来到当时革命斗争轰轰烈烈的上海，不久后便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白色恐怖下，他一面在报纸当编辑，一面参加革命活动。他曾经三次被捕入狱，在敌人的威逼利诱面前，始终坚贞不屈，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的高尚气节。

当时的上海，左翼文化运动已经有了很大发展，一些进步的文艺刊物提出了“普罗列塔利亚文学”（即无产阶级文学）的主张。沫沙同志读了大量的革命理论和文学作品，思想上有了很大提高，并且开始从事文学创作活动。他非常崇敬鲁迅先生，立志学习鲁迅的“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的战斗精神，潜心学习鲁迅的文章风格，像鲁迅那样以杂文作为利器，向黑暗社会和各种反动势力进行斗争，他不断地给《申报》副刊——《自由谈》和《中华日报》副刊——《动向》等报刊投稿，他的杂文显露出思想的敏锐和笔锋的犀利，在上海文坛，他与《论语》杂志主编林语堂就小品文的格调引起的争论，曾经轰动一时。沫沙同志当时只有二十多岁，对林语堂这位被称为大作家的人提出的遁世哲学，即在反动派高压面前采取“以自我为中心，以闲适为格调”的写作态度，展开了针锋相对的论争。初出茅庐的沫沙同志，表现出无产阶级文化战士的锐气。重新翻阅他当时所写的杂文，可以看出立意的深刻，分析问题的透彻。

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沫沙同志一直战斗在新闻战线，先后在长沙、沅陵、桂林、重庆、香港等地，任《抗战日报》、《救亡日报》、《新华日报》、《华商报》等报社的副主编、编辑主任、副总编辑、主笔等职，撰写了大量的论文、评论、杂文和小说，为宣传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路线、方针、政策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建国以后，沫沙同志从香港回到北京，在中共北京市委历任宣传部副部长、教育部长、统战部长等职。在繁忙的工作之余，他不忘辛勤写作，怀着对党和人民的热爱，写下了不少讴歌社会主义新中国，匡正时弊，活跃思想，振奋精神，反对资产阶级思想和歪风邪气的杂文。这些杂文，在社会上产生了一定影响，对广大干部和群众进行思想和文化教育起到了很大作用，但是也给他自己带来了祸患。一九六一年，他为吴晗同志新编京剧《海瑞罢官》而写的《“史”和“戏”》、评孟超同志的《李慧娘》而作的《有鬼无害论》，本是两篇谈历史的真实性和从文学角度赞扬赋予鬼神形象以反抗精神的浪漫主义创作方法的文章，竟在五年后的“文化大革命”中成为“反党”罪证。同年，沫沙同志与当时的中共北京市委书记邓拓同志和副市长吴晗同志，为市委的理论刊物《前线》编写的杂文专栏《三家村札记》，又惹出无端的大祸来。“文化大革命”一开始，江青、康生和谢富治等人，首先以“三家村”发难，制造了一桩影响全国、骇人听闻的大冤案。邓拓和吴晗同志先后被迫害致死，沫沙同志被囚禁了八年，以后又被流放到江西林场，身心受到了严重的摧残。在恶劣的环境里，沫沙同志始终不渝地忠于党的事业，坚持真理，临危不惧，同林彪、江青、康生等人作坚决的斗争。他凭着丰富的人生阅历和革命斗争经验，度过了黑暗的岁月。大难未死，他终于看到了大地春回。一九七八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三家村”的冤案得到了平反昭雪，沫沙同志作为“三家村”的幸存者，也作为证明人，参

与了对“四人帮”的审判。

回顾沫沙同志走过的革命历程，他不愧是对党和人民的事业忠心耿耿，胸怀坦荡，光明磊落，为坚持真理而献身的优秀的共产主义文化战士。他生前有幸看到了自己四卷文集的出版，这上百万字的文章，给我们留下了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

我与沫沙同志最初是在香港办《华商报》时认识的。《华商报》是我党在香港创办的第一张报纸，但是以统一战线的形式出现，用商界人士的名义办报，督办人兼总经理是华比银行的华人经理邓文田，总编辑是胡愈之的弟弟胡仲持，日常主持报社工作的是副总经理范长江，我担任总主笔，主管所有社论，沫沙同志任编辑部主任，编国际国内的要闻版。我和他的工作接触很多，他给我的印象是兢兢业业，埋头苦干，勤奋学习，有较高的马克思主义修养。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太平洋战争爆发，香港沦陷，只办了八个月的《华商报》被迫停刊。沫沙同志同茅盾夫妇、胡仲持、叶以群等，由党组织派来的向导陪同，偷渡九龙，步行进入东江游击区，再转道回到桂林。我是从九龙乘船在东江遇到了从东江游击区来的沫沙同志和茅盾夫妇、胡风夫妇、宋之的夫妇等，一同回到桂林。在桂林，我和沫沙同志参加了当地的文化活动，沫沙同志还主持了一个印刷厂的工作。一九四三年春，我离开桂林到重庆。不久，他也来到重庆。

沫沙同志一到重庆，周恩来同志就亲自找他谈话，让他进《新华日报》社，担任编辑部主任。《新华日报》是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初期，在国民党统治区公开出版的唯一的党的机关报。一九三八年一月十一日在汉口创刊，于同年十月二十五日迁至重庆继续出版，直到一九四七年二月被国民党反动派强迫停刊。在《新华日报》的整个历史中，斗争是异常艰苦、复杂、曲折的。

言论是报纸的灵魂。《新华日报》几乎每天都有社论。写社论，由总编辑章汉夫同志主持的社论委员会负责统筹安排。每篇社论都要送周恩来和董必武同志审阅。我当时是社论委员会的成员之一，主要写民主、宪政和日本问题方面的社论，另外还写“国内述评”和一些论文。日本投降后，我还一度代理总编辑。平时与沫沙同志接触较多，每次见面，总能听到他对于时局的分析和见解。《新华日报》作为共产党的机关报，在国民党的眼皮下面出版发行，政治对垒异常激烈和尖锐。沫沙同志当时的工作就是上夜班，主持当晚国内国际两个版面的编排。他在编辑工作上，首先是同国民党的新闻检查作斗争。报纸除了发表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发来的稿件以外，其他任何新闻报道、评论文章、文艺作品、通讯、资料都要送国民党的新闻检查所检查。为了应付这种检查，沫沙与编辑部的同志想了许多方法，重要的评论和报道往往“化整为零”分段送检或夹在其它报道的缝隙中，使检查大员不能从头读到尾，从而让这些评论和报道能与读者见面。在周恩来、董必武等同志的领导下，沫沙同志每天要花大量的精力，在新闻版面的编排上与敌人周旋。

一九四五年底，沫沙同志在党的部署下，接受了周恩来、王若飞同志的指示，离开重庆，第二次赴香港，会同广东区党委复刊《华商报》。他是一九四五年底到一九四九年一直担任副总编辑兼主笔，在解放战争的关键阶段，为了让广大群众了解战争发展的形势，鼓舞斗志，沫沙同志除了写社论、评论之外，还负责写一个军事评论的专栏《每周战局》，以“怀湘”为笔名，发表了六十多篇军事评论。

解放后，我曾经与沫沙同志在一起工作过几年。我是一九四九年五月间到北京市工作的，当时我是中共北京市副书记（书记处成立后，为书记之一），主要职务是市政府常务副市长，在市委分工是主管政法工作，也参与过宣传、统战方面的领导工作。虽

然我不在市委办公，但工作上同他有所接触，相处甚得。在市委开会时，他总是坐在一边思考问题，很少轻易发言，但是每次讲话，都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分析问题很精辟，给人留下鲜明的印象，可以说是“夫人不言，言必有中”！他经常在报刊上写文章。文笔依然如故，幽默风趣，鞭辟入里，形象生动。除了前面所讲的那些文章外，影响较大的是一九六二年他与夏衍、吴晗、孟超、唐弢五人在《人民日报》副刊开辟的《长短录》。当时正在三年困难时期，报刊的文风不正，“假、大、空”的文章风行一时。《长短录》上的文章，别有风格，文笔清新，内容准确，针砭时弊，表彰先进，实事求是，不尚浮夸，使人读了耳目一新。

沫沙同志为人正直，心地无私，胸怀坦荡，他执著地追求真理，勇敢无畏地坚持真理。在“十年浩劫”当中，江青、康生等人对他进行了惨无人道的折磨，他遭受了常人难以想象的磨难，多少次被扭臂栽头批斗，多少次被无中生有栽赃诬陷，多少次被辱骂恐吓棍棒相加，但是他始终没有屈服，即使满口的牙齿被打得脱落，也没向“四人帮”低头。面对无情的打击和迫害，他达观自信，从容镇定，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无所畏惧的凛然正气。一九八五年，他把当年囚禁时用烟纸盒和燃尽的火柴棍写成的诗集《余烬集》送给我。读着这些感人肺腑的诗，能深切体会到他那时不屈不挠、乐观向上的斗争情景。当他与吴晗同志同台挨斗前，还相互以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的故事来打趣鼓励，在《嘲吴晗并自嘲》中写道：“书生自喜投文网，高士于今爱折腰。扭臂栽头喷气舞，满场争看斗风骚。”真是“嬉笑怒骂皆成文章”！

沫沙同志虚怀若谷，平易近人，感情真挚热诚。粉碎“四人帮”后，许多素不相识的人前来约他写文章或写字，尽管他年事已高，身体有病，还有许多社会工作缠身，但对来访者从不拒之门外，他没有一点架子，不管是谁，有求必应。虽然门前贴有“遵医嘱上午恕不会客”的纸条，但并没有起多大的作用。他在生

活上，清心寡欲，不求舒适。对于身后事，他早在六十年代就撰文呼吁从简，不搞形式主义，反对铺张浪费。他多次嘱咐家属，去世后丧事从简，不发讣告，不开追悼会，不搞遗体告别，不留存骨灰，体现了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的彻底唯物主义精神。

沫沙同志小我十岁。当我九十岁生日时，他曾在给我的寿辰祝辞中写道：“恬静无私，罕与人争；敏而好学，古今贯通；文章精锐，牛鬼心惊；笃志马列，陷阵冲锋；赤诚待人，情深义重；德高望重，谦逊从容；老犹奋发，健哉渔翁。”这对于我来说，实在是十分过奖，十分溢美，使我感到万分惭愧！实际上可作为沫沙同志自己的真实写照。我愿以此回赠沫沙同志，不幸的是他未能同我一样健在，而先我逝世了，使我更添怀念之情。沫沙同志一生对真理执著追求，对党和人民的事业忠心耿耿，做到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他的精神和许多感人事迹，值得我们永远纪念和学习。

（原载1991年11月10日《人民日报》）

《廖沫沙全集》序

李 筠

《廖沫沙全集》的出版是一件值得幸庆的事。其一，这总算了却了家人和朋友的一桩心愿，以告慰廖公的在天之灵；其二，更重要的是，一位著名文人的作品，理所当然地应该结集出版。因为，文人之文，并非仅仅属于他个人，文人的作品亦是全社会的精神财富，应该全部公之于众，以有鉴于后人。

为了结集出版廖沫沙同志的著作，他的夫人陈海云同志，先后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收集、整理廖沫沙同志的著作。她年事已高，体弱多病，行动诸多不便。因为我们两家住得较近，来往比较方便，所以她多次约我到她那里商量一些出版的事情，并嘱我为文集的出版写点什么。我是晚辈和后学，自当遵命。这次出版的《廖沫沙全集》，根据现有条件，尽可能地收集了廖沫沙同志在各个时期的著作，完全可以从中看到他一生的著作的全貌。

我读廖公的作品，了解他的文品与人品有一个过程。是由近而及远的。因为，廖公长我二十一岁，当他三十年代初登文坛的时候，我还是揩鼻涕的孩童，当然一切无从谈起。我们相识始于一九五八年，我调到北京市委主办的理论刊物《前线》编辑部当编辑，廖公当时任北京市委统战部部长，又是《前线》编委会的

编委，自然是我的领导了。然而，这位编委却有所不同，不但动口出主意作指导，而且亲自给《前线》写文章。这位著名的杂文作家，我是早有所闻的，却没想到他是那样的和蔼可亲、平易近人、写作勤奋和诲人不倦。我常到他的办公室约稿，颇有所得：一是不久会拿到稿子，例如从《前线》创刊到《三家村札记》“开张”，《前线》共发表了他的精彩杂文三十篇，（约合一个月左右一篇）。二是受教育、长知识。约稿时常常变成课堂，他讲经论道，谈天说地，兴起处往往中外经典著作，逐段逐句地开讲，讲马列原著，讲中国古典经书，诸如《反杜林论》、《自然辩证法》以及《礼记》、《左传》等等，谈话中透出深刻的见解和思维的闪光。由此，我领悟到他的杂文风采是以坚实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丰富的中华文化遗产为基础的。他的人品和文品一样，也是以此立足的。因此，他能经受任何大风大浪的考验，能够撰写出那么多具有深刻的思想性、丰富的知识性和妙趣横生的杂文。特殊的幽默、生花的文笔当是他的杂文的一大特色。我对廖公的认识就是从杂文开始的。后来，一九六一年十月《前线》开辟了《三家村札记》杂文专栏，我作为该栏的责任编辑，与廖公的接触更经常了，受到的教益也更多了，我也学起写点杂文来。这样，我们由领导者与被领导者、作者与编辑的关系进了一步，可以说有师长和后学者之谊了。

一九六六年，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了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三家村”文字狱拉开了序幕。其实，在此之前，“三家村”中最早受到批判的是廖沫沙同志。从一九六三年起，廖公就受到江青之流的“关注”，因《有鬼无害论》受到无理的批判，并压北京市委叫廖公作公开检讨。这篇在政治压力下的违心之作，由于“不自觉的”一词，引起毛主席的不满，说文章是廖沫沙自己写的，怎叫不自觉？从此，廖公下放搞四清，虽未正式罢官，实际已靠边站了。一九六五年十一月，江青、张春桥等阴

谋策划操作、经毛主席批阅三遍的姚文元《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发表，吴晗同志因“《海瑞罢官》的要害是罢官”的最高指示而彻底打倒，廖公也因《史与戏》的短文，与吴晗被捆在一起批判，紧接着用《三家村札记》，把邓拓、吴晗、廖沫沙联结起来，早已是“死人办报”的邓拓被诬为叛徒。“《前线》是邓拓的《前线》”，由此“三家村”成了扬名海内外的“黑店”。当时受株连者比比皆是，我也由《三家村札记》的责任编辑而“荣升”为“三家村反革命集团的联系人”而成了同案犯。十年浩劫，“三家村”两死一伤，廖公是唯一的幸存者。粉碎“四人帮”后，一九七八年我首先得以平反，临时分配到北京市委落实政策办公室工作，受命参与为“三家村”甄别平反。由此我得以翻阅了中央专案组的材料，又与暂住朝阳医院检查身体的廖公因公而多次长谈，谈历史、谈被捕经过，谈三十年代以来的写作，申辩“四人帮”的诬陷。由此，使我了解了廖公整个的革命经历和他过去的作品。这使我深深地理解了他坚定的共产主义信仰，革命者的铁骨铮铮，在新闻战线上长期笔耕的战斗经历。这些光荣历史，在“文革”前，廖公从来未提起过的。

从三十年代初，到他一九九〇年底仙逝，一生笔耕不辍，勤奋写作了六十年，写作时间之长（应该说“十年浩劫”中也未中断，只是形式独特而已，有《瓮中杂俎》为证）作品之多，其题材和体裁之广泛，也颇惊人。他的杂文的创作是大量的，在他的一生的作品中占有很大的比重。其次，他写了大量的具有思想性、战斗性和颇有见地的论文和评论，包括政治评论、军事评论、国际评论、文艺评论、生活评论（如《恋爱新论》）等，在文学创作上，除杂文外，还广泛涉及到诗歌、散文、剧本、小说、历史小说等，《廖沫沙全集》无可争辩地说明，廖公是一位全方位的而又有专长的人民的杰出作家，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而战斗的革命新闻家，是一位坚定而求寔，勤奋而清廉，具有高层次文化素养